

新时期初知识分子的矛盾与困境

——以戴厚英为例

卢亚明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从知识生产者的角度来看,以新时期为界,戴厚英经历了与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走过的历程,即从“革命”改造型知识分子到“启蒙”反思型知识分子。新时期的戴厚英也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个身份重构的过程。但是,戴厚英又是独特的。她并不局限于倾诉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伤害,而是反思知识分子的局限与困境,并寻求突破的可能性。戴厚英在小说中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矛盾与困境,不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共同要面对的,而且是整个现代性历程本身的矛盾与困境的体现。

关键词:新时期;知识分子;戴厚英;现代性体验;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5-082-06

一、突破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禁区

新时期的戴厚英也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个身份重构的过程。但是,戴厚英又是独特的。她并不局限于倾诉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伤害,而是反思知识分子的局限与困境,并寻求突破的可能性。戴厚英的独特与她的性格不无关系。她曾这样剖析过自己的性格:

这样的性格,能够给它个什么称谓?“个人主义”?或者“自然主义”?说不明白。我只知道它十分顽强,无论我接受了怎样新的思想,也无论我如何努力改变自己,我终究还是我。正是这种性格,使我在那么浪漫和狂热的革命年代,经过那么真诚而执着的追求,也没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正是这种性格,又使我与新时期形形色色的探索者区别开来。看起来,我好像一直走在某个行列里,可是事实上,我却永远是孤立而孤独的。^{[1]20}

孤独感和与社会的疏离,却又养成了戴厚英对“集体”的无可奈何的依赖;而在“集体”之中,戴厚英又始终没

有一种完全的归属感,总摆脱不了孤立与隔阂。孤独感与集体感就是这样如此复杂地交织在戴厚英的身上。新时期以前,戴厚英努力地追随“革命”,可始终没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新时期以后,戴厚英重构自己的人文知识分子身份,但在建构的同时又无情地审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在戴厚英的身上,既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路历程,又呈现出她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独特的一面。

新时期之初,刚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戴厚英就选取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分子是戴厚英所熟悉的群体,另一方面,也是她对历史反思和审视的结果。但是,专门书写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在新时期以前还是不多见的。就是在新时期初,以知识分子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仍然具有突破意义。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变换着自己的角色,这与文艺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艺体制内对知识分子定位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在其中说到: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

收稿日期:2013-05-13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新时期文论场域中的人学问题研究”(HB13WX025);保定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新时期初文论中的‘人学’话语研究”(2011S03)

作者简介:卢亚明(1979-),女,河北保定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7]

这里可以看出,首先,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者”,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被视为有文化的人民大众。其次,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并列,位于“工农兵”之后。可见,知识分子虽然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但却处于极其危险的边缘地带。即使在“小资产阶级”合法的情形下,知识分子也还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一旦“小资产阶级”处于非法状态,知识分子也就随之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新中国建立之际,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曾对延安时期解放区文艺的整体面貌有过总结。他对《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177篇作品的题材作了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101篇。

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41篇。

写工业农业生产的,16篇。

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7篇。

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12篇。^[16]

周扬在大会上总结说:“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16-65]周扬还说:“当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了二十多年,他们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正在从事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努力去接近他们,描写他们,而仍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那么,我们就将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而且也将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16]这里,出现的三

个指代人称的名词是“人民”、“知识分子”和“群众”。显然,“人民”和“群众”是一致的,文学作品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对于知识分子题材自然严加限制。在“反右防修”期间,知识分子更是被赋予“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身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虽然在1964年河北省、市作家座谈会上,周扬也曾提倡过“文学创作应该写知识分子”。他说:“我们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支撑着我们的工业技术,但在文学作品展却反映得很少。有的作品虽有所反映,但多是写成思想落后的形象,这太片面了。”^[14]这种对待知识分子题材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虽然期间限制的程度有所不同。

“文革”结束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知识分子题材问题在文艺领域开始有所突破。

邓小平在1977年就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解决知识分子问题。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提及:“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15]这里,邓小平用“体力”与“脑力”的不同作为区分的标准,这就将“工农兵”与知识分子放在了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即“劳动者”。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一样都是劳动者。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座谈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提到了知识分子问题:“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应该怎样估计呢?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此外,邓小平又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并强调“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16]。这里,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于是,一直徘徊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身份被褪去,换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身份。

在这种情形下,文艺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也开始有所变化。新时期伊始,周扬就指出:“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作战的战友,已成为整个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象的变化是多么大呵。”“我们的文艺为之服务的对象,同时也开始成为我们文艺的主体。当我们的文艺真正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时候,就真正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了”^[17]。可见,这时的知识分子已经被赋予“革命”的称号,并被归之于“劳动人民”的行列,成为了

“文艺的主体”。

综上所述,文艺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有文化的人民大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文艺的主体”。文艺创作中知识分子题材的书写,也随这一定位过程的变化而变化。

在知识分子被定位成“文艺的主体”的新时期,戴厚英率先突破知识分子题材在文学创作上的禁区,一连创作了“知识分子三部曲”:《诗人之死》、《人啊,人!》和《空中的足音》。戴厚英当时对“知识分子三部曲”主题的设想是:第一部写知识分子为历史付出的代价,第二部写知识分子对命运的各种形式的抗争,第三部写“文革”之后的“新长征的路上”^[1]。最后实际写作的结果是:第一部写了知识分子曾经付出怎样的代价,第二部写了代价后的思考,第三部写了思考后的行动。但使戴厚英感到惭愧的是,她没能告诉读者到底应该怎样行动^②。看来,只有第一部《诗人之死》与戴厚英的预期设想一致。

在这三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被称为“人道主义宣言”的《人啊,人!》在当时影响最大。《人啊,人!》虽然是戴厚英的第二部作品,但却是最先出版的,也是戴厚英的成名作。这部作品也更能体现戴厚英创作的特点,即情与理的交融与互进,以情感体验的方式表达理性反思的内涵。

二、矛盾与困境

戴厚英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充满了矛盾与困惑。戴厚英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困境:

随着揭发“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我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也不能想象的事情。猛然间,我感到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个人发呆发愣,痛苦,叫喊。

我的灵魂在一段时期内处在黑暗中。^{[9]352}

可以看出,“文革”后的戴厚英在一段时期之内处于极度的彷徨、迷失与困惑的“黑暗”之中。曾经坚信并追随的信仰开始动摇,曾经坚信的事实被发现原来充满谎言,而新的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来。戴厚英曾借孙悦的梦境表达了这种困境。在孙悦的梦中,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田野荒凉,道路泥泞,这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等待过关。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被推来搡去,茫然不知所措。这时,一个大汉骑马一掠而过,突然有人喊那大汉:“xxx,孙悦在这里!”这一声喊,使她顿时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从情感层面来说,这表明了孙悦渴望在

感情和生活上有个坚实的依靠。而从理性象征层面来说,孙悦在当心中的神圣被消解以后感到了无助和迷茫。“大汉”的模糊形象则喻示着孙悦对重新确立信仰的渴望,但却又极其模糊和虚幻,找不到方向。这种困境并不是戴厚英所独有的,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的。

十年浩劫时期,诸如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很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的生活状况虽各有不同,但不外乎是住牛棚,受审查,挨批斗,劳动改造,上“五七干校”,去农村插队落户,乃至被迫害致残、致死^③。而人文知识分子比科技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更严重。美国学者梅斯纳曾说:“在中国社会里,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或机构摆脱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完好无损,但是也没有人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对于知识分子来说,1966—1976年那一段时间确实是‘失去的十年’”。对于知识分子之所以受此重创,梅斯纳分析道:“在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中,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最明显的‘资产阶级’。他们最易受攻击,常常是机会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由于知识分子相对缺乏防卫能力,他们成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派别(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在政治上的替罪羊。……他们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组织,因此他们比党的干部更易受攻击。”^[10]可见,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属于最脆弱的阶层:首先,“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自身没有防御能力;其次,作为一个尴尬的阶层没有组织保护;再次,作为拥有知识的“特权阶层”最易被视为与工农兵人民大众相脱离,因而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

虽然戴厚英对人文知识分子所受的磨难也深有感触,但是更令她无所适从的是精神支柱的坍塌,以及未来的支点在哪里?戴厚英此时心中充满了矛盾,这意味着她要面临新的选择与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在《人

^①参见马嘶的《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有关知识分子在“牛棚”里生活状况的著述有: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季羨林的《牛棚杂忆》,丁玲的《风雪人间·下卷》之《牛棚小品》,《谭其骧日记》中的《文革日记》,陈学昭《沉浮杂忆》中的“灾难的年月”,刘冰的《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杨绛《将饮酒》中的《丙午丁未纪事》,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中的第八章《遭遇“文化大革命”》,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顾潮《历教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中的第九章《暮年岁月》,韦君宜《思痛录》中的《“文化大革命”拾零》等。有关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生活状况的著述有:《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杨绛的《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版)、臧克家的《忆向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三联书店1984年版)等。

啊,人!》中,戴厚英借孙悦与李宜宁的对话将思想上的这种矛盾呈现了出来。李宜宁在小说中虽然不是主要人物,却是戴厚英精心设计的一个人物。她是孙悦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另一个孙悦。她们的对话可以看作是孙悦在和另一个“我”对话。孙悦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关心政治、追逐理想、自然本色的人文知识分子形象。而李宜宁则是一个在经历过种种磨难后,变得厌倦政治、不问世事,只关心自己小家庭的人。李宜宁在精神上的满足感不是来源于什么社会理想的实现,而是来源于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用李宜宁的话来说,就是“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人离不开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来使我愉快”^{[9]143}。作为政治教师的李宜宁却可以做到不问政治,安于经营自己“爱的小屋”。孙悦喜欢她,羡慕她,但却无法成为她。孙悦无法放下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公共关怀,无法使自己过一种没有信仰的平庸生活,也无法躲进自己“爱的小屋”而不问世事。孙悦与李宜宁的对话,既体现了戴厚英在社会转折期的思想矛盾,同时,也喻示着她在个人的家庭生活与公共的政治生活之间的抉择。

三、理想与希望

戴厚英并没有一直徘徊在矛盾与困境中,而是积极地寻求新的理想和希望。何荆夫是戴厚英着力塑造的理想型人物,在何荆夫身上,也寄托着戴厚英的理想与走出困境的希望。这种理想的建构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部展开的,主要围绕着何荆夫写作与出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体现出来。这种理想的建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性”的关注;二是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倡导。

戴厚英借何荆夫之口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伟人心里都有一个‘人’,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他们的革命实践,都是要实现这个‘人’,要消灭一切使人不能成为‘人’的现象和原因。可惜,我们有些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只记住了他们的手段,忘记了或丢掉了他们的目的。似乎,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人的人性,破坏人的家庭,把人与人用各种围墙阻隔起来。我们消灭了封建的经济等级,却又人为地制造出许多政治等级来”^{[9]187}。何荆夫写那部书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人的感情。在他到处流浪的时候,伴随他的有两套书:一套是《红楼梦》,一套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里《红楼梦》是人性、人情的象征,作者显然是想寻求这两套书的结合点。戴厚英在小说中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克服特别关注,这体现在何荆夫与许恒忠有关“人性”的一次对话中。在许恒忠看来,“人就是动

物,人类的生存竞争比一切动物都残酷,因为他可以定计划,有意识、有目的地去竞争,还可以把自己的低级欲望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起来”。何荆夫认为:“承认人的自然属性(生理的、动物的)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并且对人类生活有影响,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人,而恰恰是要提高人,要我们自觉地去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性。”^{[9]49-50}而且小说中还以恩格斯的观点为依据:“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么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9]66}许恒忠和何荆夫都看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但是两人对待“人性”之恶的态度却不同。许恒忠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学会了世故,让自己去顺从“人性”之恶。而何荆夫则是在正视“人性”之恶的前提下,努力去克服“人性”之恶。他的主张是,只有正视与关注它,才能克服它,而不是回避它。而这正是对历史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何荆夫特别强调一个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何荆夫说:“你本来是一个血肉之躯。你本来有一颗会跳的心。你的脑壳里装着脑髓,因此可以思维,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感觉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你的思想,作出你的判断。你有嘴巴,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不做学舌的鹦鹉。”^{[9]172}何荆夫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中写道:“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把我们逐渐训练成为这样的人:不习惯于思索人的价值,不善于形成对生活的独立见解,不喜欢培养自己成为独特的个性。”^{[9]281}这里,小说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人的价值”和“个性”联系在一起。只有发挥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实现人的价值,才能形成自己的个性。

戴厚英除塑造了与她同时代的理想人物何荆夫外,还在下一代中塑造了奚望。从谐音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人物正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奚望看来,祖国和人民的经历也就是他的经历。在这经历中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要思索,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权利^{[9]79}。强烈的反思意识和公共关怀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戴厚英除了将奚望塑造成何荆夫的后继人形象外,还给这个人物增添了一些独特的色彩。奚望在小说中时时处于论辩之中,有与父亲溪流的论辩,有与继母陈玉立的论辩,有与孙悦的女儿憾憾的论辩,甚至还有与自己所认同的对象何荆夫的论辩。作者将这个寄托着自己希望的人物塑造成一个辩论中的斗士的形象,可见戴厚英对于理性反思与独立见解的看重。奚望与何荆夫曾就“血缘关系”有过一场辩论。何荆夫认为,血缘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初状态,最基本的单位。要是连血缘关系也处理不好,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和

社会呢?然而,奚望却将看重血缘关系视为一种封建观念。他认为正是血缘关系支配着许多干部为了子女的利益向人民伸手,甚至违法乱纪,损害人民的利益^{[9][8]}。可见,奚望所关注的并不局限在个体的家庭关系上,他更关心具有公共性质的事情,表现出更多的公共关怀。而这正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希望所在。

四、结语

戴厚英在小说中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矛盾与困境,不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共同要面对的,而且是整个现代性历程本身的矛盾与困境的体现。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在研究“现代性体验”时曾指出:“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展开了论述,这两个方面将塑造和激发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化: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11][3]}在伯曼看来,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能给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不是一条摆脱现代生活的矛盾的出路,而是一条更加有把握更加深入的进入这些矛盾的道路。他知道,超越矛盾的道路将不得不经现代性,而不是摆脱现代性”^{[11][6]}。可见,现代性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只有深入地体会矛盾的存在和复杂性,才有可能走出困境。可以说,戴厚英所展现和思考的既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感触和体验,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性体验”。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体验的主体的一部分,只有置身于现代性历

程之中,深入现代性历程的矛盾之中,才可能寻求突破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M]//戴厚英文集:第6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M]//周扬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4]周扬.文学创作应该写知识分子[M]//周扬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49-350.
- [5]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M]//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1.
- [6]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M]//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9-51.
- [7]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M]//周扬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77.
- [8]徐泓.留下一个历史的足迹[M]//吴中杰,高云.戴厚英啊,戴厚英!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295.
- [9]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
- [10]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张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430-432.
- [11]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ntellectuals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Case in Dai Houying

Lu Ya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producer's perspective, the new era for the sector, Dai Houying experienced the same course with her most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that i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reform intellectuals to “enlightenment” reflective intellectuals. As with most new era intellectuals, Dai Houying also has experienced an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process. However, Dai Houying is unique. She is not limited to talk about the harm suffered by intellectuals, but reflects on the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o seek a breakthrough possibility. Dai Houying demonstrated intellectual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novel, it is not only a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to face in common, but of the whole history of modernity itself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Key words: the new era; intellectual; Dai Houying; modernity experience; identity

(责任编辑 王作)